

新闻理论 与新闻改革

沈世纬著 • 上海三联书店 •

XINWEN
LILUN
YU
XINWEN
GAIGE

新闻理论与新闻改革

沈世緯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沪)新登字117号

特约编辑 查志华

责任编辑 周瑶明

封面设计 郭伟星

新闻理论与新闻改革

沈世雄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书由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常熟第七印刷厂印刷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3 1/32
印张: 5.5 字数: 135000
印数: 1—1000

ISBN 7-5426-0512-7/G·82

定价: 4.80元

序

这本册子，搜集了作者近几年关于探讨新闻理论和新闻改革的部分文章。作者试图以马列主义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对新闻实践中一些有争议的重大问题进行剖析，在党性与人民性、新闻媒介的耳目喉舌功能、新闻自由、新闻观念更新、反映舆论与引导舆论以及舆论监督等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分清一些理论是非，是一本有见解、有深度的新闻学论著。

作者长期生活在新闻工作第一线，对社会主义时期新闻工作有较深切的体会。本书对改革开放时期新闻实践中冒出的一些新问题，诸如新时期新闻工作的特点、规律以及记者思维方式、活动方式、报道方式的变革等，进行研究和探索，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此外，通过总结业务经验，围绕新闻记者如何做好新时期新闻工作，对提高记者的素质、加强理论和新知识储备、苦练调查研究基本功等问题进行了阐述，读了有所启迪。

我们党所领导的新闻事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优良传统和作风。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闻工作又面临新的形势，新的课题，需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丰富多采的新闻实践，呼唤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的学习和研究，加强理论建设，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但不可讳言，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建设状况，同我们正在进行的新闻改革实践相比，是不相称的，新闻理论研究滞后于新闻

改革实践，这就需要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激发起大胆探索和创新开拓精神，善于对丰富的新闻实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回答新闻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毛泽东".

目 录

序

从宏观微观两方面提高观察力	1
中性新闻初探	8
谈谈记者的创造性思维	13
转换新闻视角 改变报道形象	19
参与意识——记者主体性的突出表现	24
新闻改革要着眼于提高社会效益	29
深度报道与思维方式	40
变革我们的报道方式	44
记者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特征	50
非事件性新闻刍议	57
“非事件性新闻”不能否定	61
记者，探寻理论和新知	65
关于新闻反映与引导舆论的思考	70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新闻的本质真实	77
增强党性 当好喉舌	84
新闻价值初探	87
试谈新闻写作中的模糊性语言	93
关于记者编辑的职业道德教育	98

专题调查初探.....	102
新闻与想象.....	112
摒弃线性单一因果律的报道模式.....	117
强化宏观意识 纵论“上海风云”.....	121
在经济宣传中多注意人的因素.....	127
增强记者的主体意识.....	130
略论韬奋的人民报刊思想.....	135
——为纪念韬奋诞辰 95 周年而作	
新闻观念更新问题上的分歧.....	143
让哲学登入新闻的殿堂.....	149
动乱后对新闻改革的思考.....	154
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两种对立观点.....	164

从宏观微观两方面提高观察力

新闻界的一位前辈说，作为政治观察家的记者，要具备两种目光：一种是宏观的目光，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通观全局，见微而知著；一种是微观的目光，对自己采访的事物作细心的观察和积累，“吃透”局部情况。把宏观与微观巧妙、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使自己的观察力胜人一筹，成为一个高明的记者。

这位前辈的话是颇有见地的。它揭示了记者获得成功的一个“诀窍”：就是要从宏观、微观两个方面来“磨炼”自己的观察力。一个纵横捭阖的名记者，往往既能以宏观的目光，俯视当代变幻的风云，又能以洞幽烛微的眼力，捕捉到很有报道价值的典型事物、场面乃至细节。

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写到列宁的观察力时说：“他善于精敏地观察实际生活，察出旁人漠然放过去了的现象，从工人阶级利益的观点上来估量一切细小事体，而后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来分析他所见所闻的一切，并根据这些小事体来说明大的原则问题。”列宁，作为无产阶级杰出的政治家，很善于从宏观、微观两个方面来观察问题，并把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记者，作为政治观察家，也要学会这种本领，能以非凡的洞察力，“察出旁人漠然放过去了的现象”，并从笔端表现出来。一篇脍炙人口的新闻佳作，往往是从宏观、微观两个角度对客观事物进行观察、思索的结晶。

大凡有成就的记者，都是将宏观与微观巧妙结合的高手，记者无畏的胆识与过人的才智，深深地蕴藏在他的新闻作品之中。埃德加·斯诺是记者中的一代风骚。他被人们誉为驻中国最勇敢、最富有进取精神的新闻记者。他把自己对解放区的观察、感受融汇贯通，既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解放区，充分估量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前景，又以社会学家的眼光来观察苏区，要从这块自己迷恋的“新大陆”来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正因为斯诺对解放区作了这样的宏观鸟瞰，所以写出的报道气势磅礴，不同凡响。但他对解放区的这些感受、见解又是通过许多生动的现场和感人的细节来表达的。他在一篇关于中国陕北地区农村变化的报道中写道：“透过一个通向隔壁窑洞的门，我能看见几双儿童雨鞋和一双帆布球鞋……一只柚木桌子和几把椅子，桌上放着一把茶壶和一些瓷碗。我蓦地想到，在过去，这样一些东西只能在一个地主的家中看见……”斯诺以细致入微的观察力，捕捉到一个农民家庭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向读者具体展现了陕北农民家庭生活的变化。

穆青等同志写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这两篇通讯，之所以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重要原因是记者对生活的宏观与微观结合得好。通讯把吴吉昌、“老坚决”身上表现出来的崇高的思想品格和精神风貌，放到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去展现：在十年内乱中，人民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粉碎“四人帮”后，人民迫切需要澄清被林彪、四人帮搞得头足倒置的理论、实践问题，总结历史经验，团结一致向前看。而吴吉昌那种“啥也别想挡住俺”的精神，“老坚决”那种顽强抗击人为“风口”袭击的斗争毅力以及对安定团结的强烈渴望，有力地回答了上述课题。正是由于记者站在时代的高度，作这样的宏观鸟瞰，通讯才有了高屋建瓴之势。而在表现这个重大主题时，记者不是靠苍白无力的事实与空泛的说教，而是绘声绘色地应用了大量细节。譬如，写吴吉昌被勒令去割草，他看到大队的棉花正在疯长，很想提醒社

员们，但想到自己的处境，欲言又止。直到第二天，当社员们走出棉田休息时，他才鼓足勇气走过去。人们用同情、关切的目光注视他。一位中年妇女说：“吴老模，你给指点吧。”吴吉昌凄然一笑，摆摆手说：“好妹子，不敢再称劳模了。”那位女社员噙着眼泪说：“老大哥，俺们心中有数……”这个细节，既揭露了四人帮这些“迫害狂”摧残劳模、破坏生产的罪行，又写出了群众对吴吉昌遭遇的同情、支持，表现了吴吉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往情深，读了催人泪下。

掌握宏观，了解微观，这对记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比较而言，掌握宏观尤为重要。宏观者，全局之谓也。记者要成为政治活动家，一定要胸有全局，了解国际、国内的政治趋向，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向，善于从全局考虑问题。新闻主题的确定和报道时机的选择，也应从政治、思想上着眼。粉碎四人帮后，新华社播发的《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稿件，在全国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对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篇报道，是记者从北京市委一个洋洋数万言的报告中抓出来的。记者为什么能独具慧眼，在一个普通的报告中发现最有新闻价值的东西？主要是因为记者有宏观的目光，掌握了当时国内重大的政治思想动向：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殷切地期望拨乱反正，把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给冤假错案彻底平反，特别是给全国最大的冤案——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是埋藏在人们心底的呼声。但“两个凡是”的阴影，当时还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它窒息了人民解放的空气，禁锢了人们的手脚。人们要求冲破“两个凡是”的罗网。就在这骨节眼上，这篇报道先声夺人，说出了亿万群众想说而没有说的话，击中了当时社会上“紧绷的弦”。不把握全局，不了解全国的政治形势，是断然挖掘不出这样震撼人心的好新闻的。

在记者生涯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些记者到同一个地方采访，有的能敏锐地抓出很有份量的新闻，就像潜水员潜

入五光十色的海底世界，捕捉到了陆地上罕见的珍品。有的却身在宝山不识宝，一些很有价值的事物出现在面前也失之交臂，什么也抓不到，只能空手而返。产生这种差别的重要原因，是记者是否具备宏观目光。有的记者常年在工厂农村里转，鞋子也跑破了，但由于只注意了解小局部的实际，不了解全国的大局，不善于判断自己采访的事物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写出的报道往往就事论事，陷入业务性、技术性的圈子。我们常说，记者要有新闻敏感，但这种敏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记者是否具备宏观目光。新闻的第一要素是“新”，但判断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旧闻，也要拿到宏观的“天平”上去衡量。

记者有了高瞻远瞩的宏观目光，当新事物在地平线上刚冒出尖芽，就能迅速地把它抓住。就像盘旋于高空的雄鹰，由于飞得高，视野开阔，捕捉地上的猎物就十拿九稳。记者有了这种本领，即使报道的是一个典型事件、一个典型人物、一个基层单位，但由于着眼于全局，同样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时代精神。譬如被评为全国好新闻的《赤壁公社书记赞十好》，写的是一个公社在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发生的深刻变化，用基层干部的亲身感受赞扬了三中全会政策深得人心。由于记者研究了全局，抓住了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怀疑三中全会精神的思潮，用铁的事实，回答了当时带倾向性的重大问题，使新闻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公报说出了心里话》、《党组织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活着的黄继光》、《“光棍堂”引来四只“金凤凰”》等好新闻，写的虽然是一个教授，一个战士，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可是由于记者立足点高，掌握了全局，所以报道洋溢着浓厚的时代气息。

对记者来说，综览全局，审时度势，使自己具备宏观的眼光，这固然是十分必要的；但光有博大的宏观，没有洞幽察细的微观，也是写不出好新闻来的。就像建筑师一样，光有钢筋混凝土的骨架，而无砖头、瓦片，就盖不成漂亮的楼房。因此，记者一方面要“入乎

其内”，对自己采访的事物，从历史到现状，作深入的调查，细致的观察，捕捉有典型意义的场景、细节；另一方面要“出乎其外”，就是要跳出具体事物的圈子，从全局意义上估量被采访事物的价值，透过事物的表象，把最本质的东西“抓”出来。把宏观与微观巧妙地结合起来，记者就可以在自己活动的天地里纵横驰骋，通天贯地，获得充分的“自由”。

在新闻写作中，有的记者善于用大处着眼，小处落笔，以小见大的手法来表现新闻主题。这是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的好方法，得值得提倡。有时看来是一件小事，很普通，但把它放到宏观的背景下去“透视”，就发现小事不小，隐藏着丰富的内涵，很有报道价值，就像一滴水反射出太阳光一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党的经济政策的落实，农村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记者用以小见大的笔法，记载了这场历史性的变化；有的写党的富民政策像块磁石，把过去由于贫困而外出的“游子”一个个吸引回来；有的写农民的粮囤，过去是空的，现在粮食堆得冒了尖；还有的写农民餐桌上的变化……这样一个个生动的侧面，组成了我国农村发生巨变的动人画卷。这种以小见大的报道，掌握了宏观与微观的辩证法：大是小的灵魂，小是大的细胞，离开了全局的小，就成了坐井观天，没有普遍指导意义；但离开了小处的大局，就没有个性，没有特点，失去了说服力。只有把两方面结合起来，由小见大，寓大于小，才能相得益彰。

“蹲点”与“跑面”，也是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的有效途径。有经验的记者下去采访，往往不是见到一鳞半爪的东西就匆忙动笔，而是深入到点上，对采访对象进行深入解剖，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后，又从“点”上跳出来，撒开腿跑“面”，多跑一些地区和单位，把“点”上积累的思想、见解、问题，拿到“面”上去考察，作一番比较和分析，看这些东西有没有普遍意义。把“点”和“面”都作了剖析后，记者就胸有成竹了，写出的报道就能高人一着。

善于从宏观、微观两个方面来观察事物，这可以说是记者的一项基本功。它涉及到记者的理论修养、政策水平以及调查研究的深度。要练好这项基本功，需要记者作不倦的努力。

首先要熟悉、掌握全局上下功夫，对全局的形势要有深刻的理解，对自己所采访的事物在全局的地位要有正确的估量。中央的方针、政策，中央对某项工作的意图与决策，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一个时期突出的思想倾向……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全局，记者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并悉心进行研究。记者要掌握全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摆脱“条条观”、“块块观”的束缚。现在记者都有行业的分工。适当的分工当然是必要的，但分工过细，只满足于固守自己的行业，甚至“隔行如隔山”，搞工业的只了解工业，搞农业的只了解农业，搞文教的只了解文教，采访上层建筑的记者不了解经济基础，搞经济基础的对上层建筑也不甚了了。这种划地为牢的分工和采访方法，容易把记者囿于“条条观”、“块块观”之中，而不能从宏观上来认识被采访的事物。打破行业上的过细分工，摒弃不适应形势需要的陈旧的采访方法，多搞一些突破地域限制的交叉采访，让记者多跑、多看一些地方，这些都有利于记者打掉“条条观”、“块块观”，开阔自己的宏观视野。

记者还应把读书和实践结合起来，不断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思想理论水平。“宏观”，好比是记者的“望远镜”，“微观”，好比是记者的“显微镜”，记者要用这两把镜子观察世界，都离不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记者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是照镜子式的自然主义反映，而是要由表及里，入木三分，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离开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就不能获得这种观察力。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的是要把读书和实践结合起来。干记者这一行，更不能关门读书，而应该充分利用记者工作的有利条件，把读书和调查结合起来，用马列主义理论作指导，不断研究新情况，探索新问题。特别是当前开展的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触及面极其

深广的“第二次革命”，我们对此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体制改革中也有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等待我们去熟悉和探索。要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有深度地反映这场“革命”，必须刻苦学习，勇于实践。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实际生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闻宝库，记者只有“沉”到生活的源头去多看，多问，多挖，不停顿地体会与积累，提高自己的观察力，才能写出好新闻来。在画苑中以画竹驰名的郑板桥，曾在一篇文章中自述画竹时的情形：“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中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此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这段话简洁而形象地叙述了艺术创作的过程：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跃然于纸上之竹，这就是细致的观察、生活的感受和艺术加工融于一炉的过程。郑板桥说的虽是画竹，但对我们搞好新闻报道同样有启迪：记者要像画家一样，要有敏锐、细致的观察力，要有对生活的实际感受和积累，并善于对素材进行概括和提炼。记者采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观察生活、思索生活的过程，是积累大量的知识、材料、观点的过程。总之，只有深入实际，到生活的“源头”去观察、积累，才能提高自己的宏观、微观能力，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好新闻来。

中性新闻初探

中国古老大地上奔涌的改革大潮，向新闻媒介传统的报道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些新颖的新闻文体在中国报界崛起。引人瞩目的中性新闻，就是新闻文体改革中涌现的一支“劲旅”。

过去，由于受左的思想和形而上学的影响，报道模式形成了一个两极式的框架：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表扬稿往往是隐劣扬优，批评稿往往是隐优扬劣。好与坏被置于两极，泾渭分明。另外，报道往往报喜不报忧。讲成绩头头是道，连篇累牍；讲问题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对决策中的失误，群众生活中的尖锐问题，重大责任事故，来自基层的批评……诸如此类的“忧”，很少触及。这样做的结果，使群众对党和政府产生了隔膜，减弱了群众对某些改革措施和社会问题的承受能力。喜和忧被置于两极，壁垒森严。在人物报道上，往往追求高大完美，习惯于采用典型人物的报道手法，以至于强拉硬凑，人为拔高，给先进人物蒙上了“神化”的色彩，使读者感到可敬而不可亲，可尊而不可学。这种片面性、终极式的报道模式，不仅使新闻产生肤浅的弊病，而且容易导致报道失真，隐瞒事物真相，使读者对新闻媒介产生逆反心理。

改革的伟大实践，迫使新闻工作者对这种传统的报道方式进行深刻的反思：只讲事物一面的新闻思想和新闻文体已经难以容

观、真实地反映改革的历史进程。改革的实践如此多姿多采、纷繁复杂：旧体制盘根错节，新机构尚不完善，市场收收放放，大进大退。生活中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得与失的权衡，利与弊的对比，权与法的较量，风险与收获结伴而行，“阵痛”与欢乐先后降临。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无一不是新旧观念、新旧体制摩擦、碰撞、牵制的结果。至于改革舞台上崛起的风云人物，生长在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各种体制交织的“土壤”之中，本身具有过渡性与不稳定性，人们对他们的看法往往褒贬不一，颇有争议。客观情况的变迁，要求记者抛弃终极式的报道方式，选择更能反映、解释改革实践的报道形式，于是，中性新闻就应运而生。

笔者认为，中性新闻一般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中性新闻舍弃了传统报道形式中浅层次、表面化的流弊，对报道对象进行全方位审视，从各个侧面、各个角度对报道对象进行考察。在报道客观事物时，记者不满足于平面镜似地机械反映事物的表象，而是力求作立体式的扫描，既反映事物的“正象”，又折射事物的“反象”，尽力挖掘事物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涵，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思考与启迪。一些成功的中性新闻，往往具备这一特征。譬如，《经济日报》关于关广梅现象的系列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是被新闻界公认为搞得相当成功的报道。其成功的奥秘就是打破了传统的报道方式，较好地发挥了中性报道的长处。关广梅是商品经济的弄潮儿。由于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她的改革措施触及了一些人的利益，因而引起争议乃至非议，有人称她为“没有资本的资本家”。《经济日报》突破过去典型人物报道的框框，没有花笔墨去渲染关广梅的种种事迹，而是把关广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放到改革的大背景下作深刻的剖析，采用多种报道体裁，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反映了传统的商业体制同商业体制改革发生的冲撞，反映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之间的矛盾，揭示了改革进程中各方利益关系调整中所带来的冲击。在对关广梅现象作了

多方位的动态“透视”后，报道在更高的层次上“聚焦”：“关广梅租赁商业企业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答案是：要用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判断是非的重要标准。关广梅报道的成功给了我们一种启示：改革的时代呼唤与之相适应的报道方式，而中性报道就是一个有力的新闻武器。

中性新闻的另一个特征是：打破对客观事物“好”与“坏”的简单评价，变两极为多极，变单立面为多侧面。在同一篇报道中，可以将成绩与问题于一炉，融表扬与批评为一体，既有褒，又有贬，既反映“得”，又反映“失”，既反映“利”，又反映“弊”。把事物的各个侧面都结合起来写，呈现出杂色纷陈、交相更迭的态势。采用中性报道方式，能更真实地反映改革的进程。因为改革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改革之举也不可能完美无缺，往往是得失并存，利弊共生，只是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比如，放活市场，就会出现非法经营的“倒爷”；改革物价，就会有人乘机哄抬物价；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免不了出现收入上多寡倾斜；对外开放，打开“窗户”，也难免要飞进苍蝇蚊子……所以，用中性新闻来反映改革，可以如实描绘改革中的曲折历程，既反映改革的成果、得益与欢乐，又反映改革付出的代价、失落与苦恼，能有效地克服报道中简单化、片面性的倾向。当然，我们反映改革中的成败并存、利弊共生的现象，应注意把握主导方面是利大于弊，成功大于失败。一些好的中性新闻，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人民日报》记者写的《功与过》就是一例，这篇报道生动地记述了福州手表厂曲折的改革历程，展现了人们在改革中的各种心态。工程师郑雪华等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集体承包了濒临倒闭的手表厂。他们锐意改革，勇于开拓，全厂提前12天实现了全年上缴税利计划。正当改革向纵深推进时，匿名信、控告信不断飞到有关部门，各种检查团也纷至沓来。改革中也确有失误：发厂服，超标准招待，私设小金库……在传统的报道结构中，成功与失误不可能被捏在同一稿件